

皇家也爱「高科技」

●周乾

电灯照亮紫禁城

19世纪电灯的发明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,这种照明技术很快传入了我国。光绪十四年(1888年),慈禧准备还政光绪帝,退居西苑(今北京市北海公园附近)颐养天年。时年上半年,清政府从祁罗弗洋行,购买了蒸汽直流发电机及电灯材料,将其安装在仪奎殿西墙外的鳌头作胡同内。11月,上述设备安装完毕,为西苑供电,同时西苑电灯公所成立。12月29日,光绪帝师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:“电灯照耀于禁林。”由上可知,清代宫廷最早的电灯安设在西苑。另光绪十七年(1891年),清政府在耶律楚材祠南侧(今颐和园文昌阁附近)安设发电机组,为颐和园供电,并成立颐和园电灯公所,管理园内电灯事物。由于清廷内部保守势力的反对,相比于西苑、颐和园而言,紫禁城内安设电灯的时间较晚。

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,紫禁城中开始安装电灯。此时,慈禧已在颐和园、西苑使用电灯多年,充分感受到其带来的便利。清末舞蹈家裕德龄曾于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进宫,为慈禧担任了两年的御前翻译。她在《慈禧野史》中回忆道:“慈禧对于别的新思想或新器具,大都没有什么好感,唯有对于电灯,却是特别的欢喜……”此外,据《北京电力工业志》载:光绪三十年(1904年)八月十七日,清政府批准成立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,负责向京城供

电。此时居住在宁寿宫的慈禧,有意在居住处使用电灯。

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,内务府奉宸苑购买了大悲院朝房25间,用于安设发电机器,并成立宁寿宫电灯公所,隶属于西苑电灯公所管理。大悲院朝房位于北池子大街的西北角,距离东华门约500米。

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,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双双崩逝,但宫廷电灯线路的扩建,并没有因此止步。宣统元年(1909年),隆裕太后颁懿旨,要求在建福宫、长春宫、御花园各宫内外安设电灯,且电灯安设首先从建福宫正殿开始。其中,建福宫、长春宫在内廷西部区域,御花园在内廷中轴线区域。宣统三年(1911年)年底,紫禁城内廷区域建筑内的电灯基本安装完毕,供电方式也进行了修改,改为由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供电。

故宫藏老照片中,有20世纪初的乾清宫殿内照片。照片中,宝座的上方、正大光明匾额的前方,悬挂有一盏吊灯。此吊灯由灯架、灯罩、电线和灯泡组成。灯架含小孔径支架管7根,镂空圆弧形装饰板6个,以及底部中心处的灯罩1个。各支架管内均含电线。灯罩内含有灯泡,而各支架管的端部,均向下挑出一个灯泡,犹如皇冠冕边上的一排排垂珠。此吊灯的造型,颇具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特点。

清末及民国时期,宫廷内所用灯泡均为进口。故宫亦藏若干老式进口灯泡,例如其中一只长约12厘米,宽口处直径约6厘米,玻璃罩面的“PHILIPS”字样清晰可见。此灯泡由卡口底座、金属架、钨灯丝、中间的玻璃支柱、玻璃泡组成。金属架主要起固定、支撑灯丝的作用,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和机械强度。钨丝作为加热带,具有较高的熔点和热稳定性,因此寿命较长。灯泡内有若干组钨灯丝缠绕在金属架上,以增大灯丝的总长度,提高发光的效率。上述灯泡的使用,可反映百余年前的紫禁城,对国外照明技术及材料的认同。

末代皇帝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里,回忆了自己与电工的一段奇缘。清末民初,骑自行车在北京成为一种风尚。1922年溥仪大婚,溥仪的堂弟溥佳就送了他一辆自行车作为贺礼。有一天,溥仪在御花园里学习骑自行车,在拐弯的地方差点撞到一个人。此人跪在溥仪面前不走,说给万岁爷请安。溥仪看他满脸胡渣,知道不是宫里的太监,便问他是干什么的。此人回答说是宫里的电工,在宫里负责安装维修电灯,并希望溥仪赏赐给他一个官爵。溥仪想了半天,给这名电工封了个“镇桥侯(猴)”。此电工十分感激,果真找内务府要“官诰”去了。这段史料说明,在民国中期,紫禁城里的电灯供应及维护措施,已经比较成熟了。

因地制宜

●张艺瑶

“因地制宜”出自东汉赵晔《吴越春秋·阖闾内传》。该书记载,吴王阖闾与伍子胥商议政事,询问怎样才能让国家强盛起来。伍子胥回答,要修筑好防御工事,将城墙筑得高大坚实,发展农业,把粮库充实起来。吴王表示认可,说道:“夫筑城郭,立仓库,因地制宜。”意思是说,修筑城防,充实仓库,广积粮草,这些都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去做。

吴国地处东南,河湖纵横,水网密布,气候潮湿,时有水害。伍子胥根据吴国的自然地理条件,“相土尝水,象天法地”,设计建造起一座都城。外城周长47里,城内又筑小城,城中布局对应着天象的方位。都城设陆门水门各8个,城内开凿河道,加强运输,既保障充足的用水资源,又使地形便于防守,形成水陆并开的格局。吴王阖闾还在伍子胥的建议下在城中设置守备、积聚粮食、操练兵马、充实兵库。这种“因地制宜”的措施,果然很快就使吴国强盛起来。

宜,会意字。其古字形像砧板上放着

两块肉的样子,本义是祭祀时供奉给祖先的菜肴。《诗经·鲁颂·閟宫》有“是殽是宜”,说的就是置办了一桌的酒肴,敬请诸神前来享用。合乎口味的佳肴又可引申为“合适”“适宜”之意,这是我们今天的常用义项。《诗经·大雅·假乐》有“宜民宜人”,这里的“宜”即适宜,意思是执政必须顺应百姓的心意。《说文》:“宜,所安也。”因为适宜,所以感到安定、满足。这里的“所安也”已并非“宜”字的本义,而是引申义了。

伍子胥在帮助吴王阖闾成就霸业的时候,运用了“因地制宜”的思想,就是充分地顺应大自然,根据环境的客观性,采

取适宜自然、合乎规律的生产方式。这种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宜措施的方法,常常用于各个领域。农民根据气候环境种植适合的作物,工人依据地理条件建造宜居的屋舍,企业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……因地制宜,短短四字,为发展生产、开展工作指明了方法路径。

因地制宜,基础在一个“地”字。古人云:橘生淮南则为橘,生于淮北则为枳。同样是橘子,生长环境不一样,结出的果实就不同。这充分说明外部环境对事物的影响作用。要正确制定策略,首先要摸清当地的实际情况,这就需要深入的调查研究。正如古人所言,“入山问樵、入水

问渔”,只有善于向内行求教,在不断的交换比较反复中,才能摸清家底,掌握实情。

因地制宜既蕴含着中国人尊重规律的哲学智慧,也是对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运用。根据实际情况,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,如此,方能返璞归真,善作善成,切实造福于民。

因地制宜,关键在一个“因”字。因地制宜体现的是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,蕴含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要求。我国幅员辽阔,各地资源禀赋、发展条件各不相同。因地制宜的关键就是立足当地的条件,从实际出发,根据具体情况办事,选择真正适合本地区的发展道路。一刀切、一哄而上等做法,都是违背实事求是根本原则的。

因地制宜,落脚点在一个“宜”字。何谓“宜”?顺应规律,是“宜”;让群众感受到安定满足,更是“宜”。要用好“因地制宜”这一方法论,以人民群众需求为工作导向,精准施策、循序渐进、久久为功,不断点亮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顾炎武的“访学”之旅

●柏峰

学之旅。

访学太行东西

顾炎武首先抵达山东。途中,经过淮北,遇上连日大雨,“跣行二百七十里,始得干土,两足为肿”(《蒋山佣残稿·答人书》),可见他访学之旅的艰辛。

顾炎武到莱州府掖县落脚。异乡初到,观感甚多,有诗云,“海右称名郡,齐东亦大都……登临多感槩,莫莫一穷儒。”(《亭林诗集·莱州》)顾炎武最大的收获,是在任唐田家读到宋儒吴越著的《韵补》,于是开始深研上古音韵,完成《韵补正》。他随后到即墨,游劳山,抵济南。

顺治十五年(1658年),顾炎武登泰山,心胸为之开阔。山东是儒家发祥地,顾炎武自然要拜谒至圣先师,旋赴兖州至曲阜,拜谒孔庙,接着在邹县拜谒周公庙、孟庙,也算是文化的“寻根之旅”。

顾炎武在邹平游张氏万斛园,访古碑于郊外;再抵章丘至长山,复至济南,复赴莱州等地,一路收获丰富。次年,自居庸关返邹平后,他静心订正了《邹

平县志》。

他为了生计,置田舍于章丘大桑庄。

康熙元年(1662年),顾炎武前往山西,来到闻名天下的云冈石窟所在地大同,之后,到浑源州,渡汾河至平阳府。康熙二年,自平阳登霍山,赴太原,至代州,游五台,之汾州,历闻喜县裴柏村,拜晋祠,寄托思古之幽情。康熙五年(1666年),出雁门,并在此结识了关中大诗人李因笃,与其商量集贤荒于雁门之北。在山西,顾炎武结交傅山、戴廷斌等文朋诗友。

康熙七年(1668年),顾炎武因为黄培诗案入狱,在济南府蹲了7个多月的监狱,幸有他做京官的外甥与李因笃等人的相救而获释。

学者赵俣生认为,顾炎武北学,从时间上大致可以分为两段:将顺治十四年(1657年)至康熙六年(1667年)这11年为他人生中划一个段落,为学取得丰厚的收获:

(一)对山东半岛中部(主要是青州)一些历史地理情况,结合文献碑碣,进行了一些落实;(二)对明朝蓟辽、宣大“三边”的历史地理形势以及用兵攻

守成败的经过,做了一些检查落实;(三)对太行山(包括北岳恒山)做了“反复”的旅行考察,有时自井陉口入,有时自飞狐口入,并且对山西有时自北而南,有时自南而北地进行调查。以上这些活动的收获,他考虑情况,分别纳入他的《肇域志》《郡国利病书》《日知录》等大型专著之中。那时有专题小册或其他另种著作如《山东考古录》《读觚》《金石文字记》《营平二州史事》(已佚,仅余《地名记》),以及《北岳辨》等单篇文章。

从顺治十五年(1658年)至康熙十九年(1680年),除在山东之外,顾炎武还北学于河北、京师之地。他6次拜谒天寿山,游历了薊州、遵化、玉田、永平,登上今河北卢龙县西十五里的孤竹山,拜谒“耻食周粟”的夷齐庙,并远足考察山海关。

清代学者全祖望非常赞赏顾炎武治学精神,说:“凡先生之游,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。所至厄塞,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。或与平日所闻不合,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,或经行平原大野,无足留意,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。”(《顾炎武全集·神道表》)这种“采铜于山”求实求真的治学精神,堪为表率。

“筑山居”于关中

康熙二年(1663年),顾炎武首次入关。在《三侄书》里,他说:“秦人慕经学,重处士,持清议,实与他省不同。”还说,“然华阴绾毂关、河之口,虽足不出户,而能见天下之人,闻天下之事。一旦有警,入山守险,不过十里之遥;若志在四方,则一出关门,亦有建瓴之便。”(《亭林文集》)关中文化氛围好,地理位置也好,不但“绾毂关、河之口”,而且各路消息灵通,再说如果有险情,也能够立即入山避匿。

进入潼关,顾炎武以历史与地理学家的眼光打量此关,有诗云:“黄河东来日西没,斩华作城高突兀。关中尚可一丸封,奉诏东征苦仓卒。紫骝岂在青城

谁说演艺空间只能是封闭的剧场?

陕西西安有个“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”,以逼真的场景和互动还原“长安”盛况,颇为“圈粉”。游客行走其间,可以看到唐代美人从名画《簪花仕女图》中走出,执扇浅笑;可以同琵琶女一起泛舟,与“白居易”相逢相识;还能登高远望,欣赏万邦使者来朝献艺的盛况……在这里,游客不只是观看者,也是演出的参与者,可以沉浸式感受唐风唐韵。类似的这样的演艺新空间,如今在各地蓬勃兴起,为演艺市场吹来一股新风。

作为一种新业态,演艺新空间以其“新而奇”“小而美”等特点,更多地嵌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,构成了对传统演艺的创新补充。它跳出镜框式舞台的束缚,让演出场地有了多元形态。无论是商业综合体、产业园区、文化街区,还是古建筑、老厂房、社区公共空间等,都可以变身演出的“舞台”,让人们在逛街、旅游、参观展览时,甚至在回家途中就可以看一场精彩的演出。演艺新空间的出现,给人们带来了便利、舒适的观演体验,满足着人们多层次、多元的观演需求,为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增添亮色。

演出场景更新,助力艺术形式创新。在演艺新空间里,从剧目制作,到表演形式,再到观演关系,都有了更多的创新和突破。比如,沉浸式青春剧场《恰同学少年》在湖南长沙橘子洲上演,游客走进剧场即是“演员”,在观剧和演剧中激发理想信念的力量;新国风环境式越剧《新龙门客栈》将舞台搬进“客栈”,观众席位就是“客栈”用餐区域,观演互动创造了更多即兴演绎,观众也在沉浸式观演中与舞台叙事达到更好的共情。由此可见,演艺新空间带来的不只是空间上的“物理变化”,更是艺术上的“化学反应”,为演出行业的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拓展了空间、注入了动力。

演艺新空间的兴起,也打造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,发展出多种业态,形成了“戏剧+餐饮”“观演+游览”等多种相互引流的新商业模式。在安徽省安庆市,由黄梅戏戏曲元素与新业态融合而生的文化艺术体验馆——小韩店受到欢迎。在这里,可以喝咖啡、看展陈,还能体验一把黄梅戏服饰及摄影,如果想听一场原汁原味的黄梅戏,还可以移步旁边的再芬黄梅公馆。演艺新空间以多种业态衔接潮流,丰富了戏剧的产业链,给消费者带来更新鲜有趣的体验,为激活文化消费注入新动能。

文化是一个城市最独特的标识、最动情的表达。无论是活化利用古建筑,还是创新融入商圈,抑或是改造原有演出场所,演艺新空间盘活了城市既有资源,让优质的文化内容充实城市生活。各种文化新场景、新业态的不断涌现,也在丰厚着城市的人文气质,赋予城市独特魅力。如今,“跟着演出去旅行”等文旅消费新热潮不断兴起,展现着不断成熟的文化IP赋能城市发展的潜力。在城市发展过程中,更加注重文化空间的打造、文化服务质量的提高,有利于擦亮文化名片,助力城市发展。

从老会馆古韵传新声,到百年大戏院飘来咖啡香,再到写字楼里看演出……一家家演艺新空间惊喜亮相,一项项跨界新玩法引领风潮,“花式”创新的文化供给,谱写着人文与经济交融互动的新曲。推动演艺新空间健康发展,塑造“处处皆剧场,人人可艺术”的文化氛围,一定能带给人们更饱满的文化获得感、幸福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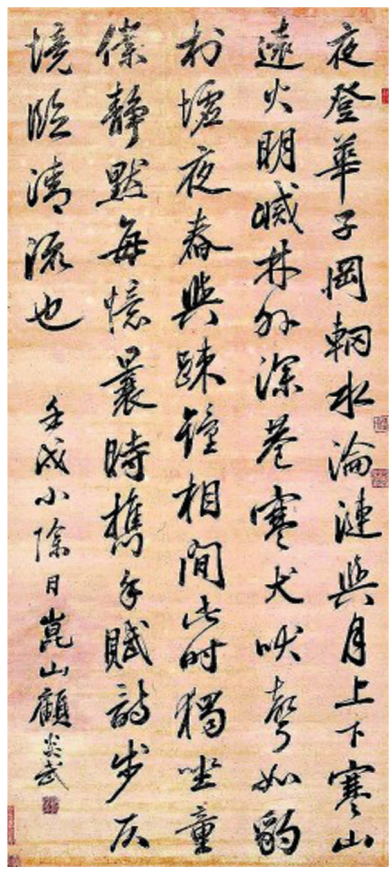
终老河东曲沃

顾炎武既“筑山居”于关中,为什么突然决定离开呢?他在《与熊耐菴书》中说:“三峰之下,弟所愿栖迟以卒岁者,而土瘠差繁,地冲民贫,非所以为后人计……故东向而思托足耳。”在这段话里,顾炎武表露出自己的真实思想,关内秦地“土瘠差繁,地冲民贫”,也就是说,经过他在太华山下的切身感受,这里多为山地,并不肥沃,加之各种差役和赋税繁重,不堪忍受,再说,顾炎武曾经在华阴买水田四十亩,估计也难以落实。李因笃表弟也曾劝他说:“长源(按:朱树滋)谓秦俗最薄,劝吾归吴,至于再四”(《亭林文集·蒋山佣残稿·与子德书》),这些都是顾炎武最后下决心远走河东曲沃的主要原因。

康熙二十一年(1682年)正月,顾炎武到达曲沃,居住浹河之畔的东韩村,因上马坠地而病倒,去世前,勉力回复李因笃的闻讯,作绝笔五言诗《酬子德二十四韵》。去世后归葬故乡千墩镇。

顾炎武访学路线,主要沿着山东半岛—华北平原—汾渭平原。“往来曲折二万里,所览书又得万余卷”(《亭林佚文辑补·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征天字书籍启后》)。这仅是对他往来鲁、燕和京师之间的描述,不包括晋、陕、豫等地的访学历程。但是就全程而言,顾炎武大致循着我国历史文化发生发展的中轴线行走。他自述道:“比二十年间,周游天下,所至名山、巨镇、祠庙、伽蓝之迹,无不寻求危崖,探窈窕,打落石,履荒榛,伐颓垣,备朽壤,其可读者必手自抄录。”他又说:“往往怀毫纸墨,踞踞于山林狼虎之间。”(《亭林文集·金石文字序》)他的行旅设施极为简单,“频年足迹所至,无三月之淹,友人赠以二马二骡,装驮书卷,所雇从役,多有步行,一年之中,半宿旅店……”(《亭林文集·与潘次耕》)终年步履不停,探幽寻微,如此艰辛,却毫无退缩,个中原因,他告诉外甥徐文元:“必有体国经野之心,而后可以登山临水,必有济世安民之识,而后可以考古论今。”(《亭林文集·答人书》)如此远大的经济天下的学术抱负,是支撑他为学与远行的坚强信念。

“北学于中国”的顾炎武,终获巨大学术成就,在经学研究、文字音韵学、历史地理学等方面,多有建树,著有《日知录》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《肇域志》《音学五书》《金石文字记》《亭林诗文集》等皇皇巨著,开清代乾嘉汉学先河。



顾炎武《行书王维诗》 资料图片



江苏昆山的顾炎武纪念馆

资料图片